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未来的转折

未来的转折

联邦德国通向信息社会之路

〔德〕洛塔尔·施佩特 著 李良健 刘小田 译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通县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印张 122千字

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7-5014-0410-0/D·252定价：2.50 元

印数：00001—2500册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部 对文明政治的几点评述	
第一章 公众舆论的作用	
亡羊补牢 犹未为晚	(9)
第二章 政党的使命	
治国安邦 造福桑梓	(16)
第三章 社会团体的危机	
改弦更张 因势利导	(22)
第二部 通向信息社会之路	
第四章 向信息社会迈进	
情况复杂 前途未卜	(35)
第五章 电子计算机	
强化智能 不具智慧	(42)
第六章 职业领域的大变革	
迎头赶上 莫走极端	(47)
第七章 未来的初级阶段	
网络纵横 信息频传	(53)
第八章 接受新技术的挑战	
我行我素 择优选用	(58)
第九章 一体化的新城建规划	
环境优雅 气象万千	(64)
第十章 高智能决策人材	

技术高超 自主自决……………(75)

第三部 旧价值观与新社会体制

第十一章 信息社会的第四产业

广阔天地 任君翱翔……………(85)

第十二章 信息社会的两大特征

宏观控制 机器代劳……………(107)

第十三章 新技术的优势

降低能耗 净化环境……………(114)

第十四章 市场经济与福利国家

馈之甚丰 卯粮寅吃……………(121)

第十五章 新型社会秩序

公私协调 互补互助……………(127)

第四部 欧洲：一个既小又大的洲

第十六章 欧洲究竟立足何处？

既小且大 令人烦恼……………(141)

第十七章 欧洲正面临全球性挑战

集中力量 务实图强……………(154)

第十八章 东西方政策

纷争不断 和解有术……………(168)

前 言

举凡政治家而欲著书立说者，往往易于被人误认为，此公必是无所事事，或根本不懂从政之道。君不见，政治拥有权力之大实非其它任何一种行业所能比拟。它能把设想变为现实，并制定新的规划。既然如此，又何必要走舞文弄墨的弯路呢？如今，各种出版物充斥市场，又有谁认为非得要由政治家来充当文人学士不可呢？政治家应该行动，应该制定具体的措施并使之付诸实现。至于反思和评论这类事情则有其他人视之为己任，其人数之多足以胜任愉快。

然而，我从政愈久，愈对这种分工的作用产生怀疑。事实上，在一个开放社会里，由民主议会制确立的政治并没有多少“权力”，它不再是一种能施加决定性影响的实体，而是权力的傀儡。它或被政敌诽谤得一无是处，或被政友吹捧得尽善尽美。立法机构在行使其权力时会迅速受到同级或上级职能部门的制肘。这类情况不仅在州里有，联邦政府或欧洲共同体内也是如此。许多行政指令由于不知道是否有把握通过法律上的审批程序以及由此而来的旷日持久的等待，从而使决策者无法使相关者获得对指令的明确感。而诸如从垃圾处理场里发现毒品，或者对公众感兴趣人物的财产进行调查之类的事情却在一夜之间成为大众媒介头版头条的新闻，从而左右着政治的进程。在广阔的领域内，诸如环境保护、促进科研、选定道路标志、扩建机场或确定发电厂厂址等等，

政治决策只不过是走走过场而已。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政治活动的余地微乎其微，大有降到零点之势。

我们这个社会为限制政治权力的扩张而采取了一系列的监督措施。分权制是最富传统的，新闻自由确实是最具实效的，许多公民日益增长的积极参与政治生活的愿望从长远的角度来说则可能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为这种愿望在保证通过法律程序解决诉讼和形成公众舆论方面均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从法制国家的民主观点来看，这一切都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对这种受到多方牵制和旷日持久的程序和那种只要一按按钮结论便立即清楚显现的传统进程模式提出同样的要求，寄予同样的期望，那么事情就会变得难办，因为这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但是，往往是同一些公民，他们批评优柔寡断的政治，而当事情临到自己头上的时候，他们又拒不承认各级法院，乃至终审的庄严判决。新闻界也是如此，他们呼吁，在环境保护方面要授予政府更多的行政权力，在社会领域内则要求在具体问题上有更多的特许权，但同时又抱怨国家机构过于臃肿庞大。

请注意，这里并不是在推诿责任，也不是讨论政治决策的失误咎由谁取的问题。但一个社会至少要在大体上清楚它到底想要什么，它究竟崇尚哪一种价值观。对生产进行逐个工序检验的人不可能指望和对生产只进行中间检验和成品检验的人获取同样的生产速度。一条水流湍急、大落差众多的河流肯定在生态学方面要比人工挖掘的运河更有价值，但它却无法通航。把某个目的绝对化必然会排斥其它的目的和目标。

上述事实尽管是如此的简单明了，但以我之见，它还全

然没有在联邦德国的公众意识中扎下根。

恰恰相反，正在进行着的是一场“分裂”式的社会政治探讨，大体上按照下列的模式：公众团体、利益集团和新闻界在表述各自的目的和愿望。总的来说，这些目的和愿望作为公众的期望几乎囊括了一个工业国家所希望做到的一切——清洁的环境、人道的工艺技术、新的工作岗位和稳定的就业、多一些社会公正，少一些国家干预、减少公债发行额，增加公共和私人投资，改善基础设施，多接近民众，提高行政效率，尽可能减少存入数据库的个人档案材料。

如何向这些目标迈进并使之实现，这一责任无需多加考虑地推给了政治。因为，归根到底这正是政治的天职，再则，它还拥有必要的“贯彻实施权”呢。

而政治方面之所以乐于接受“一切均可办到”这种神话，是因为只有这个神话才有可能鼓动选民的积极性。政治推动着一大批实施机构，而将社会目标的描述拱手让给了非政治圈子里的那些民意代表们。因为，这样做一是更为省事，二是由于政治家们缺乏进行“哲学思辩”的时间，三是因为唯有办实事才能在公众面前展示自己的政绩。

不难预见，这种“职能分工”的后果必定是灾难性的。提出宏伟目标而又不承担实现目标的政治责任的这个最大分母和最终实现了的目标这一最小分母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日趋加深的失望感正在使双方走向极端。一方是越来越急不可待地催促实现既定目标，并用越来越黯淡的色调来描绘不能实现目标会带来的严重后果；而另一方则越来越倾向于将每一个微小的进步和改进措施都说成是通向“应予实现的宏伟目标”的重大突破。这种螺旋式升级的结果会导致信任感

的丧失，会增加整个体制从根本上决裂的可能性，毫无妥协的余地，而且会使政治四分五裂，不再具备对话的能力。

我并不是说我们已经到了这种不可收拾的地步。但没有人能否认存在着向这一方向发展的令人不安的趋势。在这种形势下，政治家不能将有关社会发展前景的问题全盘交给有组织的利益集团和公众媒介去讨论而自己不闻不问。他必须努力提出自己对未来的见解，并且不惜付出这种代价，即这种见解可能远远地超越出他目前的活动范围。他必须力求人们理解他的这一见解：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各个局部的总和永远不等于整体。因为，如果把某个特定问题的全部因素压缩为一个封闭的体系，而不给比较、相对和妥协的立场留有余地的话，那么我们面临的便不复是个多元化的社会，而是僵化的意识形态了。

本书的宗旨在于求得一种宏观的、为“协调”对立面留有充分余地的立场。这里需要重申的是，我这样做是出于对这样一种态度的忧虑：在论证政治社会问题时越来越片面，但同时却越来越坚持唯我正确的做法。我认为这种忧虑是完全有理由的。正当我们在联邦德国将目标绝对化，将立场僵硬化，以尚不完美为理由推翻解决问题的模式的时候，我们周围的世界却在经济和技术上以令人眩目的速度日益密切地加强合作，以求得共同的繁荣。各国正在制订着共同的远景规划。为实现这一规划，国家、科学界、经济界和全社会以积极的态度通力合作。各国的企业正在兴建着世界范围内的信息交流网络，有朝一日，这些网络作为基础设施，其重要性必将超过国家范围内的交通和运输系统。新的合作轴心，尤其是太平洋地区的合作轴心已初具规模、初现端倪。按照经

济实力的规律，这个轴心能够造成全球性的政治力量的转移。

目前经济和技术方面的根本性变革的时间间距越来越短。因此，对于制订战略性的发展与远景规划的需求也越来越大。但战略的制订要求有高度的组织性，需要全力的支持和积极的参与。在一个自由社会里，这一切都不能靠上边的硬性指令来完成和实现，而是要靠耐心的说服工作来争取。我们是否能成功地做到这一点，首先要靠所提出的样板模式的可信赖性及基本的信念，而不是靠政治或社会的技巧。

过去，联邦德国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依靠社会模式的鼓动性力量而维持下来的。个人在物质上追赶他人的意愿以及市场经济的优越性提供了足够的刺激力量。但随着结构适应性上的问题日益增多，新老两代人之间价值观念的明显差异以及官僚化的分配制度所表现的僵化，在社会发展前景方面所造成的失误已经十分明显，这一切已成为，并继续成为前进的阻力。

一个由全体公民承担的面向未来的转折必须从此地开始了。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和精神上都要和旧的工业社会诀别，并慎重地为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新时代做好准备。这需要时间，不可能一蹴而就。但道路已经指明，回头路是走不通的，回归过去意味着葬送未来。我们有着光明的前景，我们必须认识并理解这一点。继工业社会之后将会出现一个新型的社会，人们大都(本书亦然)把它称之为信息社会。如何称呼这一社会形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它的憧憬和描绘，以及按照这一蓝图去塑造它的意志。

本书中心议题是，技术结构的变革以及它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影响。由于这一包罗万象的变革远没

有结束，所以本书中的不少观点可能不久就会受到这一发展过程的检验而必须加以修正。我是从1984年的秋天开始动笔写这本书的，到此稿完成之时，情况就已有不同了：当时公众对于新技术的议论尚远未达到完稿时的广度和深度（达到今天这种深广度可说是顺理成章的，是值得庆幸的），当时议论的中心尚不是对新技术的实际应用及适应方面的考虑，而是奥威尔^① (Orwell) 论战式的、引人注目的对未来的想像。

我国的一些重要团体在对待这一决定未来的社会问题时采取一种片面的态度，对此我感到十分吃惊，并试图进一步探讨其原因何在。尽管现在事情无疑已经有了一些良好的转机，人们已开始用一种应有的郑重态度来探讨科技以及经济的结构问题，我还是把当时认为应该批判的东西归纳为《对文明政治的几点评述》一章。回过头来看一下，我觉得这一章中所提的问题可能已不像一年前那样急迫，但仍不能说它已失去现实意义。

其它各章也都力图证明一切事物均处于变革、探索和权衡之中。将不断有新的感觉、新的知识补充进来，不断有新的问题提出来。所以整本书并不是对固定事物的结论性评价和判断，而是一本“学习札记”。置身于大变革的洪流之中，它也只能是一本学习札记而已。

斯图加特

罗塔尔·施佩特

1985年8月

^① 奥威尔(George Orwell, 1903—1950)英国作家Eric Blair之笔名。他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前景持悲观态度。——译注

第 一 部

对文明政治的几点评述

第一章 公众舆论的作用

亡羊补牢 犹未为晚

凡一国之民众，在其共同的生活中共有一些基本规律可循。其中之一似乎是在一段特定的时期内公众将大部或全部精力倾注于某一特定的事物上，就像浪潮涌起时一样，公众舆论会高度集中到这个题目上，并在很短的时间里就产生出不可抗拒的，达到巅峰的压力，迫使政治家采取必要的对策。

对于这种“民众兴趣转移周期”的形成及其持续的时间长短没有统一的模式。六十年代中期在联邦德国各州兴起了一阵教育改革的热潮，其主要原因是由于教育哲学家格奥尔格·皮希特于1964年发表了题为《德国教育的灾难》的系列文章。在这之前，虽然也有一些人就联邦德国教育政策中所存在的或据称存在的弊端发表过单篇的文章，但只有皮希特那种卡桑德拉式的紧急呼吁才产生了真正的政治动力。他宣称在近期内德国文科中学毕业生的总数甚至不能满足补充新师资所需的人材，更谈不上为确保与一个工业国家相适应的科学领先地位提供足够的后备力量。

七十年代初，要求实行计划化和集权化的狂热像瘟疫一

样蔓延开来。其主要的动力则来自于官方机构。当时，有一种自以为其影响力已达到巅峰的学说，把现实中各种类型的社会结构都说成是每一个负有责任的政治家的必不可少的工具。在这一学说的推动下，再加上当时波恩政府各部以令人吃惊的速度增设计划部门，于是，各州政府都急忙着手纠正自己迄今在远景规划方面所存在的“掉以轻心”，紧接着是各乡，各县和各职能部门也一环套一环地开始改革。这一浪潮持续数年之久，它牵制了大量的政治和行政力量。确切地说，在这段时间里各级行政机构，主要就是以自身为其工作的对象。但由于这一点和当时普遍的气候相适应，所以非但没有引起人们注意，反而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

另一个公众注目的焦点是生态问题。这个周期影响深远，延续的时间更长，直到现在仍牵动着每一个人的心。

早在六十年代，环境保护问题已被列入所有政党的基本施政纲领之中。许多著名的经济理论家也都连篇累牍的论述这个问题，比如，早在1962年，阿尔弗雷德·米勒——阿尔马克就发表了题为“改善我们生活中的公共环境条件”的文章。他认为，在他提出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第二阶段中，环境保护问题应和伦理——哲学基本问题一起列为未来经济和社会政策的核心。

从此之后，数十亿马克投入到废水净化系统和大规模垃圾处理之中。这一文明的功绩并没有引起公众的特别反应，但只有当人们出国旅行而感到缺少它的时候才会懂得其全部价值之所在。1972年，“罗马俱乐部”^①发表了那篇轰动一时的有

^① “罗马俱乐部”(《Club of Rome》)是一个学术团体。其成员均为西方国家的学者。他们经常对世界政治、经济问题发表看法。——译注

关经济增长有限论的文章，尽管文章在学术上并不完善但它使生态问题的争论达到一个新的高潮。

如今，环境问题之所以如此热门，是有一系列原因的，诸如技术上的、政治上的、精神上的和发展史上的等等。下面对新的社会政治潮流进行内容探讨时，我们还要更详尽地分析这些原因。

可以预见，即使是关于生态问题的论战也会像所有波浪式的政治运动一样遭受同样的命运：先是敏感期，在此期间公众舆论催促政治家迅速采取对策，随之而来的将是兴趣的逐渐淡漠，直至最后出现反向行动。

在六十年代教育改革的压力下，出现了一系列的变革：文科中学高年级及毕业考试标准降低，把高等学校变成群众性教育机构，教师数量和教育经费剧增，其结果是每年要接受数千名年青教师和管理人员，不得不为他们提供新的就业机会。

当这一改革引起的连锁反应的最后一个环节尚未闭合时，反向运动早已出现。它把批评的矛头指向教育改革方案所产生的明显的消极后果：教育质量下降，把有才能的科学后继人材拒之于就业门外，科研方面出现缺乏动力和改行的趋势，公共管理部门臃肿庞大，国债剧增和就业机会的减少。

二十年后的今天，在要求造就能保证未来发展的尖端人材的急切呼声中，我们几乎又回到了原来的出发点上。现在我们正力图满足这一呼声，把轮子回转，按“宁缺勿滥”的信条办事。但和二十年前相比，我们已不再具有相同的财政和体制上的活动余地了。

“由上边”掀起的管理组织体制的改革也遭到了类似的命

运。改革的所谓效益尚未一丝一毫的提高，更不用说已具体落实到一分一厘上，却已经出现了新的改动，对变化了的公众看法已不得不做出新的让步：小的行政区域得到了更多的参与决定权，设立了新的中层行政机构来解决相邻地区的事务。对闭塞的乡村学校的学生实行免费接送，这对学生来说，固然是一种安慰，但费用却十分贵昂。联邦政府为负担区域合并需要特别的财政拨款，至今，没有人能够，也没有人愿意明智地计算一下，为进行行政管理改革一共花费了多少钱，收益又是多少。而民众在文化上，社会上和心理上的向后转清楚地记录在所有地区和乡镇的记事日程上。他们所走的是分散管理权之路，是“越小越好”之路，他们习惯于照管一个一目了然的小地方，公民们就是以自己的方式来纠正一边倒的倾向。

在一个开放性的社会里，这种周期性地把注意力侧重于某个特定问题或某个特定“世界观点”的倾向，严重地威胁着任何一种政治和社会的健康发展。有些事情，如科学界和舆论界认为急待解决的问题，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十分重要，实际上大都是一些意识形态上的短期展望，它与现实还有一段距离，凡是在新闻媒介、利益集团和科学界一哄而起的舆论压力下产生的“民众意向”，通常都成为向极端化迈出的第一步，也是决定性的一步。这一步迫使政治家采取措施，而这些过激措施产生的后遗症，要花费巨大的财力和周折才能治愈。然而，须要指出的是：那些“无缘”被一致的努力推向公众兴趣顶峰的发展项目，其遭遇如何呢？还有那些得不到公众媒介的宠幸，政治家因其“不合时宜”的提出，就像是破坏了公众的安宁和秩序一样受到责骂的技术课题，又受到何